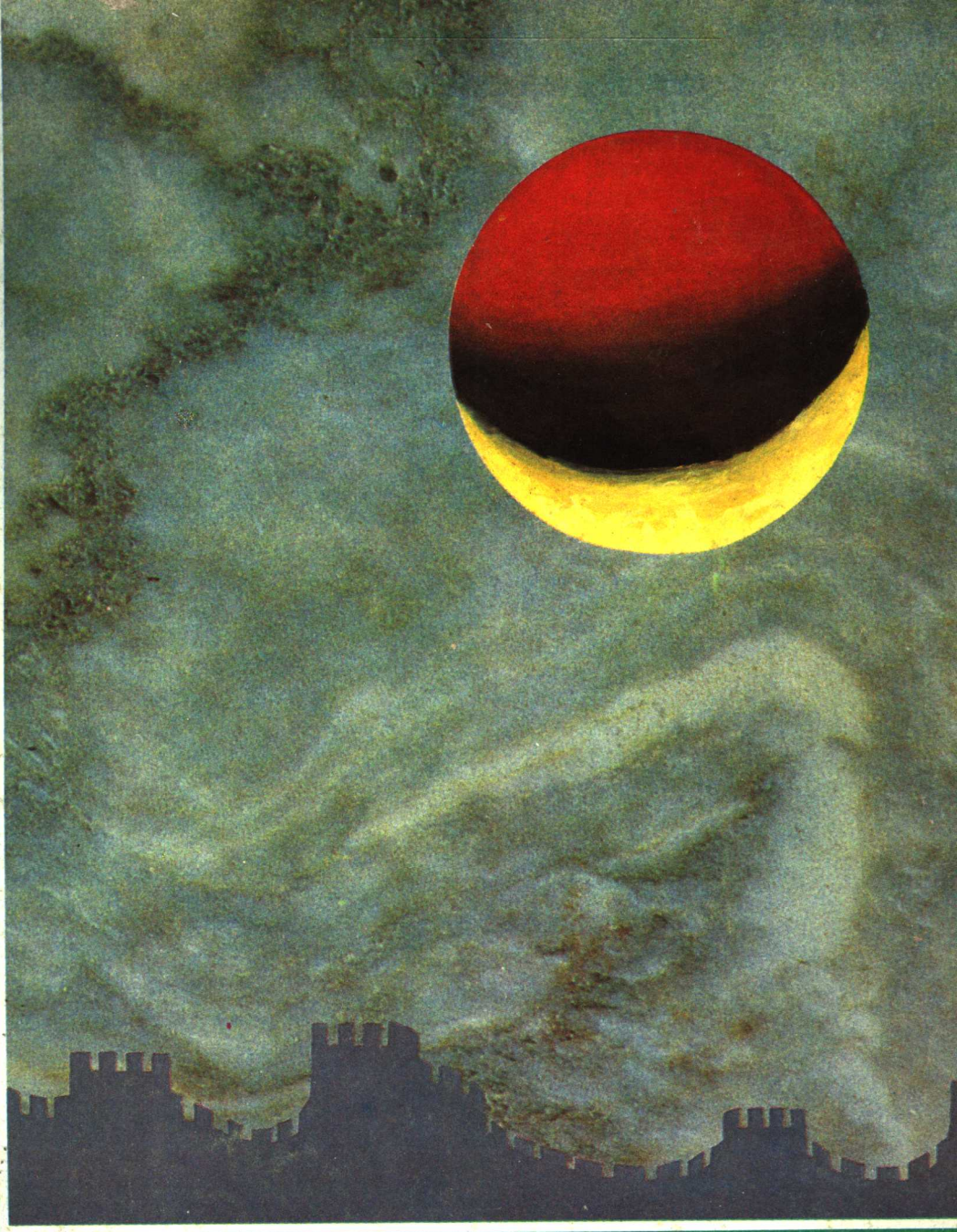


JUNSHI ZILIAO



4

1988

军史资料

RW9/2283/05

1988



刊名题字:

杨尚昆

双月刊

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总第二十八期)

目 录

主 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辑: 《军史资料》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市旃坛寺一号

出 版: 解放军出版社

印 刷: 一〇一工厂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刊 期: 7月10日出版

书 号:

ISBN7-5065-0351-4/K·29

登记证号: CN11-1152

0.70元
行

人物春秋	陈毅在华中抗战前线……钟期光 傅奎清 吴肃	2
回忆与思考	从陆军到海军……肖劲光 12 华北第三兵团在平津战役的日子里……杨成武 18 回顾岷洮西战役……杜义德 32 征途漫忆话中帼……刘坚 37 鞍山、海城战役中的第四纵队第二十九团……王觉 41	
专题研究	周恩来在红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贡献……徐元冬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宋宝恒 54	
史料荟萃	江西各地武装暴动综述……江西省军区党史办 27 日军在晋察冀三分区的暴行……黄文明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奖章情况……豫平 64 我军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名单(1955年至1957年) ……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供稿 66	
大事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刘树发 73	
传统风范	嘉言懿行 ——介绍我军部分高级将领不计个人名利的事迹 ……济南军区党史办 60	
史迹博览	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南京军区党史办 70 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北京军区党史办 71	
军史文摘	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72) 泸州顺庆起义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72) 斯大林要尤金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72) 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53)	
史实考订	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的几则史实考证 ……易仕先 51	
历史影集	……封二	
我军历史上所佩用的帽徽、领章、肩章、符号	……封三	
百色起义纪念碑	……封底	

陈毅 在华中抗战前线

钟期光 傅奎清 吴肃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和战斗。我们深深感到，陈毅和新四军，这两个名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毅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正确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创造性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凭借华中敌后这个舞台，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对新四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那敏锐的政治洞察能力，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果敢的胆略，渊博的学识，坦荡的胸怀，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 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的前期，陈毅一直在斗争的第一线。他胸有全局，善于把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和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联系起来，进行缜密考察。陈毅的设想和决定往往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相吻合，一旦得到中央的赞同，他总是十分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执行。陈毅的这种可贵品格和卓越才能，突出地表现在下山改编和挺进敌后这两件大事上。

中央红军长征时，陈毅因负重伤留下，后来，同党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和项英一起，领导了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

中央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游击区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和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隔绝，各游击区并没有及时收到这一指示。时刻关注着全局的陈毅，从国民党报纸和香港杂志上透露的片言只语中，意识到这一战略转变的到来。他与项英分析研究，重新制定了游击区方针；还写了《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对部队进行教育，使大家预有思想准备。8月8日，陈毅与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8月下旬，他作为红军游击队的代表首先下山，到大庾、赣州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谈判。

在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以后，陈毅又担负起联络各地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重任，先后奔波于湘赣边、皖赣边、赣东北游击区。在陈毅去湘赣边游击队以前，他曾派湘南游击队的支队长曹树良去联络。由于湘赣边游击队的领导人不理解在民族存亡的条件下国共合作的意义，曹树良被误认为叛徒而遭到杀害。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他完全估计到自己将要面临的局面。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也为了帮助游击队的战友们一同奔赴抗日前线，他甘冒风险，不避危难，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陈毅上山后，即被捆绑审问。但他临危不惧，镇



定自若，反复阐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最后终于说服了这支游击队。

新四军成立后，陈毅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部队刚到皖南集中，陈毅就已考虑：应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积极向华中敌后挺进。他认为，日本侵略军正继续前进，虽然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但广大乡村仍无法控制，这正是我们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壮大自己进行抗战的大好时机。陈毅的主张，与党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行动方针完全一致。5月4日、5月10日和6月2日，党中央、毛泽东连续致电新四军领导人，明确指出应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后，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力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团结无

数的游击队在自己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江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但是，当时在新四军内部，对是否立即挺进敌后认识并不统一，有的担心没有得到国民党正式划定的区域就深入敌后，会影响乃至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有的则担心新四军刚由游击队改编集中，还没有来得及整训，武器装备尚未得到补充，就深入敌后平原水网地区，会被吃掉。对此，陈毅十分着急。在一次干部会上，他严肃而急切地说：国民党吸取了华北经验，早已派人在华中敌后争夺人枪了。第一票韩德勤捞去10万人，第二票戴笠捞去了5万人。我们再去，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了。

我们是抗日的武装，不积极去发展自己的力量，不去敌后打击日军拯救广大人民，将来如何去争取抗战的胜利呢？

经过努力，陈毅终于争取到了率先带领部队东进敌后的任务。根据军部首长的委托，他负责编组了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进入苏南实行战略侦察。随后，陈毅即率第一支队跟进，于6月14日到达茅山地区。

其时，苏南已沦陷半年之久，社会情况极为混乱，日军在宁沪线驻扎重兵，到处烧杀淫掠；汉奸应时而生，向侵略者卑躬屈膝；国民党的溃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乘机拼凑武装，敲诈勒索；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则公开散布失败主义，“恐日病”一时流行。人民群众备受凌辱，处在迷惘、惶恐、悲伤和愤怒之中。

面对这复杂困难的处境，为使势孤力单

的新四军在茅山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来，陈毅细致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分析苏南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做好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他考虑到部队在崇山峻岭中打了多年游击，大家对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带很不熟悉，很不习惯，不少同志有顾虑，便于5月28日，在东进途经南陵时，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运用并发展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原则，精辟分析了敌我形势，阐述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特点，提出“寇能住，我亦能住”的响亮口号。6月12日到达溧阳竹箴桥时，他又召开会议，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他强调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抗日民族战争的群众基础，比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广泛得多，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援和拥护，就一定能够胜利。

陈毅反复强调：新四军要在茅山站住脚，在困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三不”（不拉伕、不派款、不扰民）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动用群众一粒粮。他自己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陈毅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疾苦。一方面，坚决打击那些不抗日、专门鱼肉百姓的土匪，为民除害；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亲自上门动员开明绅士给雇工加工资，给佃户减息。通过广泛的宣传和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迅速消除了群众对新四军的疑虑。

要使群众把新四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更需要有抗日的行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陈毅指挥部队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坚决、灵活地打击敌人。继韦岗首战告捷后，又在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东西谢村、南京麒麟门等战斗中连连获胜。仅7月1日新丰

车站一战，就全歼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1938年8月至年底，新四军在江南作战200余次，积小胜为大胜，歼敌3000余人。日军调集重兵报复，并采取密布“梅花桩”式据点的战术进行频繁“扫荡”，企图把新四军消灭在茅山地区或挤出茅山地区。陈毅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則，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敌人的“梅花桩”中穿插盘旋，乘虚击敌。1939年2月上旬拔除东湾据点，中旬取得延陵大捷，3月袭击淳化、高资之敌均获胜。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承认“新四军真能打仗”。

从此，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江南人民看到了光明，新四军的威望迅速提高，一度万马齐喑的江南敌后，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江南敌后众望所归的抗战基地。不仅工农群众踊跃参军，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要求加入新四军的行列。当地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到1939年4月，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内，陈毅率领来茅山地区的部队，由2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

茅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以后，陈毅立即着手准备跨出茅山，向东发展，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

初进茅山时，由于国民党划定我军活动的范围狭小，日军据点林立，“扫荡”频繁，大大缩小了我军机动回旋余地。陈毅多次对我们说：进军茅山仅仅是战略展开的序幕，只要一站住脚，就应把国民党假借“军令”“政令”来卡死我军的“紧箍咒”抛掉，大踏步地向东乃至向北发展。只有这样，苏南才能朝着有利于“造成敌我相持局面，以备将来反攻”的方向转化。他的目光从来就不是只盯在某个局部上，而是放眼全局。正如他的精湛棋艺一样，在落下第一步棋子时，就已考虑到第二、第三步了。

陈毅这一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完全符合党中央最早的战略意图和后来进一步明确

的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5月4日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又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毅汇报了准备派第六团到宁沪铁路以东的苏州、无锡、常熟、江阴、太仓之间活动的想法以后，周恩来表示完全支持。随后，军部也批准了这个东进方案。

陈毅回到茅山，立即召集叶飞、何克希、段焕竞、王丰庆等筹划东进的具体部署：（一）考虑到东进是违反国民党之“法”的，第六团暂以东路地方武装梅光迪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活动。团里主要干部改名为：团长聂扬（叶飞），副团长吴克刚（吴焜），参谋长汪明（乔信明），政治主任刘飞（刘青松）；（二）为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查询，陈毅亲自起草了叶飞“因病告假”“由段焕竞暂代”的电报；（三）以特务营、独立营为骨架，以四县抗联总会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一个新六团，由段焕竞任团长，王丰庆辅之；（四）由何克希负责与东路梅光迪、强学曾等地方武装领导人取得联系。

一切准备就绪，陈毅亲自给第六团作动员。这时，军部却突然变卦，电令“六团不宜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据点林立，兵力强大，部队到那里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后来几次对我们说过：那天傍晚，他应召赶到陈毅住地时，见陈毅手持电报，心情沉重，正在屋里踱来踱去。陈毅把电报交给叶飞，继续踱步沉思。20分钟后，他问叶飞：“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干脆利索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

陈毅让叶飞再仔细考虑一下。叶飞经过

认真盘算，再一次表示：“我有把握，有办法，保证不被消灭！”“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

就这样，陈毅既“违法”，又“抗令”，硬是将部队派往东去。然后向军部发电称：“叶部已提前出发，追之不及。”吴肃当时在陈毅身边工作，担心地问：“如果军部知道怎么办？”陈毅说：“知道了再说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接着又感慨地说：“我们对顽固派有时‘斩而不奏’，现在对军部有时也需要‘先斩后奏’了！”后来我们常想，象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无私坦荡的胸怀，是做不到的。

第六团东进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战黄土塘，再战浒墅关，夜袭虹桥机场，直逼上海近郊，连战皆捷，震惊中外。1939年7月，第六团在东路初步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抗日民主运动。东进的胜利，发展了江南抗日阵地，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战信心，同时扩大了部队，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在部署第六团东进的同时，陈毅还积极筹划向北发展。他认为，向北发展，夺取苏北，是全面打开华中战略局面的关键。茅山——东路——苏北，这是陈毅精心设计的战略蓝图，并为此作了一系列努力。

早在1938年7月，陈毅就将丹阳的地方武装管文蔚部改编为丹阳游击纵队，控制了长江两岸。他曾多次沿江视察，选择主力渡江的地点。

1939年2月，陈毅指示一支队第二团一部配合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攻克扬中。4月控制了长江北岸扬州以东的仙女庙、嘶马、大桥地区，成功地铺设了北渡的“跳板”。

此后陈毅三次过江部署工作：一面抓部队的整训，以提高战斗力；一面筹建苏北特委等地方党组织。他还三赴泰州，与地方实

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等部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11月，为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指示叶飞部西撤，在扬中与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往扬州、泰州地区活动。与此同时，另以第四团主力一部与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不久，该支队与第五支队打通联系。至此，新四军已形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这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把摩擦重点转向华中。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各路大军几十万人马，分别从苏南、苏北、皖东、皖中向新四军压过来。华中地区顿时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在四面受敌的危境。1940年3月，李品仙、韩德勤在皖中、皖东对我第四、五支队发动进攻，被我击溃。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投降、分裂的危险继续发展的形势，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发出《放手发动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根据当时华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打开苏北抗战新局面，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

陈毅接到中央的指示后，一面组织向部队传达，一面部署主力北上，并再三建议军部离开皖南那个弹丸之地，从速东进至苏南地区。由于项英对军部东移一再犹豫，坐失时机。1940年6月15日，陈毅果断地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决心独立解决苏北问题。

陈毅是于挺进纵队正在进行郭村自卫战时匆匆赶往苏北的。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与李明扬、李长江部重修旧好，让他们继续保持中立，以便利用他们和国民党嫡系的矛盾。这就为挥师东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

件。接着，陈毅指挥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以少胜多，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从而改变了苏北的力量对比，使华中的战略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记得在一次干部会上，陈毅听我们唱完《新四军军歌》后站起来说：“你们唱得这样轻松，不能代表我们军歌的感情。一定要唱得深沉激昂。我在写这个歌词时，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句，有的同志建议重复一次就够了。我说不够，必须重复两次，要一次比一次高昂，要有气魄，要意志坚定。这正是我写这个歌时要强调的地方。”对此，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后来才明白，他这句话是含有深意的。东进，东进！再东进！这正是新四军赖以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陈毅忠实执行党中央战略方针的深切体验。

把政治仗和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是杰出的军事家，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在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他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非凡胆识和高超斗争艺术，把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团结到我党我军的周围，奏出了一曲曲军政全胜的凯歌。

进入苏南之初，新四军的力量十分弱小，第一、第二支队共4个团，只有4000来人。这么一支人数少、装备差的部队，要在日伪顽盘根错节的苏南腹地站住脚跟，顺利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陈毅一到苏南，就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的苏南，光是茅山附近几个县，就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好几百股。这些武装大者几百人，小的几十人，有枪有款又有地盘。陈毅亲自给“游击司令”们做工作，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抗战的主张。他们中有许维新那样的帮会头目，有巫恒通那样的知识分子，有樊玉琳、贡友三那

样的旧政府人员，也有梅光迪那样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经过积极工作，终于把大部分游击武装争取团结到新四军的周围来，壮大了抗日力量。

茅麓农林公司的经理纪振纲，是茅山地区的头面人物，在整个江南地区也小有名气。当国民党军仓惶溃退时，他又收养了300多名广东兵，装备齐全，不但有中正式步枪，还有30多挺轻机枪及一些重机枪、迫击炮。陈毅对纪振纲作了全面的了解和分析：纪出身于普通农家，早年曾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卷进过革命队伍，后来转而经营茅麓公司。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愤恨；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他痛心；但是他也不相信抗战能够胜利，对我党的抗战主张将信将疑。他拥兵不是为了抗日，只是为了自卫。陈毅认为象纪振纲这样很有代表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做得好，就可能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里来。因此，一开始就把他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

陈毅在和纪振纲的交往中，反复向他讲述我党积极抗战的主张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起初，纪振纲见新四军人少枪少，很瞧不起。他第一次来拜访陈毅的时候，还带了十数名武装卫队，坐着轿子。因此，不少同志对争取纪振纲信心不足。陈毅说：“纪振纲自称他的茅麓公司是40万投资，20年经营。这两句话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不抗战，但也不反对我们，就是为了保住他那40万投资。但是，中间道路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当时也有一些干部，见纪振纲有那么多好武器，纷纷要求把他缴了。陈毅耐心地解释说：“你们哪，就眼红他那儿挺机关枪！可你们知道不知道江南是个异常复杂的地方？一个纪振纲，当然容易解决。但是，解决了纪振纲会有什么结果呢？江南的几百个‘司令’就会敌视我们，几十万群众就会疏远我们，士绅反对我们，刀会、帮会都会

怀疑我们，我们就成了孤家寡人，还谈什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如何领导抗战？”

经过陈毅亲自登门做工作，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使纪振纲看到了新四军不但真抗战，而且能抗战，逐渐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他先后向新四军赠送了一批物资、药材，还捐助了300套棉衣。后来当日军占领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把茅麓公司的人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了上海。

对纪振纲的争取成功，使许多对新四军怀疑、观望的士绅消除了顾虑，纷纷向我党我军靠拢。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立足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在创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陈毅也是始终如一做统战工作，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陈毅首先分析了当时苏北的政治局势和各方面力量。他说，日本人的力量最强，是老大；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号称7万兵力，是老二；以李明扬、李长江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兵力约3万，是老三；新四军只有7000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四。陈毅的策略是：抗日，孤韩，联李。即老三和老四联合起来，孤立老二，赶走老大。

为了经费、弹药、地盘等问题，“两李”和韩德勤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利害冲突。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所以，早在江南的时候，陈毅就通过各种渠道与他联络，并三进泰州，表达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1940年6月，新四军先期进驻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在郭村遭到“两李”部队的进攻，我军奋起反击。陈毅及时赶到，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命令部队禁止进泰州。并主动向李明扬表示可将俘虏的人员全部释放，归还缴获的武器。李明扬在兵败城

危之际见陈毅如此真诚，共产党、新四军如此宽宏大量，感动万分，表示愿意和新四军重新和好，团结抗战。江南新四军主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假道“两李”防区，向东进驻苏北重镇黄桥的。

陈毅料定，新四军进军黄桥，必然会遭到韩德勤的军事围攻，因此，在积极做好军事部署和发动群众的同时，立即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争取的对象是朱履先和韩国钧。

朱履先，曾留学日本，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师长，后又当过几个县的县长。新四军刚进黄桥，陈毅就登门拜访，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听取他的意见，要求他与新四军合作。朱履先对陈毅的博学多才和谦逊态度很佩服，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后来，朱履先积极支持和协助新四军，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在韩德勤进攻黄桥时，他甚至走上街头，发动群众为新四军烤烧饼、运伤员。

韩国钧，字紫石，是清末翰林，北洋军阀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这时已80多岁，国民党部队中有不少投帖子的学生。陈毅对韩国钧十分尊重，曾向他征询关于苏北抗日大势的方略。陈毅知道韩国钧著有《张士诚传》，便从张士诚抗元谈起，诚恳地说：“古人云：言者，心声也。紫老爱国爱民，德高望重，万人仰赖。如若为拯救我中华而奋起，其功绩又非昔日张士诚可比。”很快就将这位80岁老人的爱国雄心鼓动起来。韩国钧看到陈毅气度不凡，谈吐不俗，胸怀韬略，真心抗战，十分感动，并受到鼓舞，答应为抗战出力。陈毅请韩国钧出面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希望通过调停议和，即使不可能争取韩德勤在共同抗日上有所进步，也要争取他在反共上有所收敛，让新四军有个抗日的起码条件。

韩国钧对新四军的处境十分同情，立即打电话和韩德勤联系。但韩德勤拒绝参加，

提出要新四军退出姜堰方可和谈。陈毅为了进一步表明团结抗战的诚意，争取苏北各界人士，稳定“两李”和陈泰运那样的中间力量，同时，也为了集中兵力于黄桥，准备反击韩顽的进攻，决定退出姜堰，让“两李”接防。

陈毅这一着棋，名叫“求心退却”。这一来，“两李”得到了一块“地盘”，认为新四军够朋友，保持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坚定；韩国钧等各界代表认为新四军确以大局为重，值得信赖。可是韩德勤却背信弃义，节外生枝，又提出要新四军开回江南才能谈判，而且马上调动主力再次向黄桥发动进攻。韩国钧终于看清了韩德勤反共投降的真相，大骂：“贼子无信，天必殛之！”

至此，陈毅已经把苏北的各阶层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把可以争取的一切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一边，彻底孤立了韩德勤。黄桥决战的胜利已经半握在手里了。

战斗打响后，陈毅仍未放松统战工作。当时，韩德勤兵分三路进攻黄桥，西路就是“两李”和陈泰运部队。陈毅知道，象“两李”那样的中间派，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容易左右摇摆的，弄得不好，就会摆向顽固派那边。因此，陈毅专门派与“两李”有素的朱克靖驻在“两李”的总指挥部进行联络。陈毅坐镇黄桥西北的严徐庄统一指挥。他既指挥军事，军用电话一直架到粟裕的前沿指挥部；又掌握政治，随时了解“两李”等部队的动静，及时指示朱克靖做好工作。于是，关系整个苏北抗战命运的黄桥决战，就出现了我军和韩德勤顽军两方激战、多方观望的局面。显然，观战的日军和“两李”都是准备坐收渔利的，我军如果稍有失误，不但日军求之不得，“两李”也会乘机捞上一把。但是，由于陈毅、粟裕指挥有方，加上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的保障，我军创造了以7000兵力大败韩顽3万之众的典型范例。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

合的十分巧妙。这是陈毅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对发展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配合全国克服当时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均有重大意义。

把新四军建设成 正规化的党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陈毅提出“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口号。

我们体会到，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四军的前身是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进入敌后发展起来的新成分，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地方武装。由于环境的艰苦，战斗的频繁，人员的分散，部队没有进行过比较正规的教育训练。新四军成立后，已经逐步发展为一个拥有7师之众的大兵团，再不是各自为战的游击队了。因此，“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无论从当时抗日战争的斗争需要看，还是从长远的争取全国人民的解放看，都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为此，陈毅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陈毅首先抓了培训干部。还在江南的时候，他就办过多期干部学习班，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江南北有三多，即人多、枪多、钱多，对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但这三多能不能为我们所有，就看我们有没有干部出去发动、组织、领导。挺进苏北后，在战斗异常频繁的情况下，他又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并亲自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新军部成立后，他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了。他说：要建设强大的正规化党军，就必须培训一支有革命思想、有知识、守纪律、忠诚于抗日救国事业的正规化干部队伍。这不仅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党我军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他建议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华中总分校，并要求各师、各战略区都举办抗大分校。1942年1月4日，华中总分校正式成立，陈毅任校长，亲自抓教学工作。在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关心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7所抗大分校，还有党校、鲁迅艺术学院、许多军政学校以及各种专业训练班，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其中旅团干部200余名），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输送了骨干力量。

陈毅特别重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并不断加强参谋工作当作重点来抓。当时，新四军各级机关的参谋工作比较薄弱，有些首长不重视司令部建设，不少参谋人员不安心工作。为此，陈毅强调指出：军事建设的重点在建设全军的参谋机关工作，参谋机关的工作是组织指挥战斗的枢纽，参谋工作与首长是一种分工，如果把参谋工作当作文武秘书，只听驱遣，无独立工作的可能，必然使首长变成忙人，毫无时间考虑大的问题。为改变这种状况，陈毅亲自拟定了加强参谋工作14条规定，作为健全参谋工作制度的依据。1941年10月，他到第四师检查工作，特地参加了该师的参谋工作会议，并要军部推广第四师参谋工作建设的经验。对军部参谋工作人员，他要求更严，经常给予具体帮助。在陈毅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参谋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各级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从1942年到1945年，各部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如程道口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是和各级参谋机关的精心组织分不开的。

在抓好干部培训和司令部机关建设的同时，陈毅还十分重视部队的全面整训。他指出：整训不应限于操课学习，而要将部队编制、制度建设、作风转变、生活改善等，围绕着整训的中心统一进行。根据陈毅的指示，各部队迅速掀起了整理编制、健全制度和群众性大练兵的热潮。对部队的整训情况，陈

毅不仅要求各单位及时汇报，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各师一些重要的整训活动，他都亲临现场。在陈毅的精心组织和关心指导下，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渐趋于正规化，游击习气和不良倾向得到克服，干部战士的战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新四军的这些正规化建设，都是在艰苦、紧张的反“扫荡”期间进行的。因而陈毅特别强调：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军队和地方的建设工作，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要经常研究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随时作好反“扫荡”的准备。他自己带头研究和总结各部队、各地区的反“扫荡”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扫荡”的战术原则。如：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拚；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机会，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侧翼，争取内线中的外线，等等。陈毅提出的这些战术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是对毛泽东游击战略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陈毅的指挥下，新四军各部队在1941年至1943年间，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歼敌8万余人。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秋季苏北的反“扫荡”。当时，日伪抽调1700余人，并以飞机作掩护，大举向盐阜进犯，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亲自部署，将主力分散，把机关人员、伤病员及老弱妇孺疏散隐蔽起来。然后，以小股部队和敌人周旋，避实就虚，来往转移，使敌人处处扑空。当敌抽调苏中兵力“扫荡”苏北时，他和刘少奇指挥一师实施反击，迫敌南调；当敌抽兵南下“扫荡”苏中时，他又指挥苏北三师实施反击，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处处挨打，

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建军工作中，陈毅还提出了“主力地方化，地方武装主力化”的要求，这是他在抗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建军、扩军方法，对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及武装力量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陈毅在会上提出：目前的工作仍处在建立地方军以减轻主力的地方任务的阶段，只有完成了强大的地方军建设，主力始有集团整训与集团机动的机会。主力缺额补充也才有经常的保证。会后，新四军抽出1/3的主力，加强各军区和军分区。这些地方武装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很好地完成了配合主力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掩护群众转移等任务，并在斗争中象“滚雪球”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许多部队后来又上升为主力，使主力不断充实加强。正如陈毅所说：加强其地方性最终是要消灭其地方性，使之转化为主力。这就是我军的辩证发展之道路。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新四军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由新军部成立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并有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陈毅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战作出的贡献，早已载入革命史册，为世人景仰。他在当年那异常艰苦、复杂、困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坦荡胸怀，豪爽性格，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也堪称楷模。凡是和他一起工作或者有过接触的人，无不受到影响和感染。

陈毅一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遇有内部的意见分歧或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既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原则，又处处照顾大局，维护团结。新四军创建初期，项英受王明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在要不要东进北上深入敌后、要不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等问题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陈毅和项英共同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是事关大局，他并不因此而迁就退让，曾经多次和项英激烈地争论，甚至尖锐地批评项英“五心不定，会输得干干净净”。即使在这种“话不投机”的情况下，陈毅仍然对项英保持了真挚的友情，每次到军部开会，都和项英同室同宿。对于项英的错误，当时不少同志有所察觉，想从陈毅那里打听一下，向来心直口快的陈毅，却从不在下级面前议论。

刘少奇于1939年11月到华中主持中原局工作以后，提出开辟苏北应是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这个意见，与陈毅不谋而合。由于当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相互间并不了解。在一些具体部署和斗争策略上，难免产生分歧，但都得到了妥善解决。陈毅为有刘少奇这样一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党中央代表而感到欣慰。“皖南事变”以后，陈毅对刘少奇更加尊重，配合默契，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政治委员制度的重要作用。就连刘少奇的健康和生活，他也十分关心。那时，陈毅喜欢在衣袋里装些辣椒，吃饭时就拿出来。刘少奇也爱吃辣椒，但是常患咳嗽，不能多吃。于是，陈毅也很少吃辣椒了。这虽然是件生活小事，却可以看出陈毅对战友的体贴和关心。

陈毅有很强的原则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陈毅带头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新四军高级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却无限上纲，向党中央诬告陈毅。但当有的同志问起他和饶漱石的分歧时，陈毅却说：“我有意见都和他讲了，背后就不要议论了。”对部属，陈毅同样赤诚相见，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热忱的关

怀。不论干部或是战士，都可以促膝谈心。记得“皖南事变”以后，陈毅找过不少突围出来的干部谈话，循循善诱，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政治上则一样给予信任。使这些同志心情舒畅地投入新的战斗。新四军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归侨，有的工农干部担心这些人吃不了苦，不能坚持到底，因而对他们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陈毅批评说：“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嘛！要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个连队的文化教员，在一次与日军作战中，躲到了床底下。战斗结束后，大家嘲笑他是“怕死鬼”，连队领导要求把他调走。陈毅知道后，就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严肃指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说：“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害怕，是不奇怪的。对有这种表现的同志，加以嘲笑，甚至调走，不是爱护同志、帮助同志的态度。”他还说：“没有斗争经验的同志，第一次有点心慌，不要紧，但要经得起考验，越是危险，就要沉着冷静。”陈毅的讲话，既使工农干部受到教育，也使那位文化教员和其他初上战场的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陈毅好学不倦，每到一地都要收集书报，在行军、打仗时还常常手不释卷。他还喜爱写诗词、下围棋、打篮球、游泳，兴趣很广。他在抗日时期所写的《东征初抵高淳》、《韦岗初战》等诗，和三年游击战争中所写的《梅岭三章》一样，都是很鼓舞斗志的名篇，战争年代就已广泛传抄，脍炙人口。1939年3月，陈毅到皖南军部听取周恩来传达党中央指示，晚上，他因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留过学，应大家的要求用法语唱了《马赛曲》。晚会后，他心情激动，诗兴油然而生，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十年》。后来，《新四军军歌》就是以《十年》为基础，经集体讨论，再由陈毅执笔修改而成的。这首军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下转第40页）

从陆军到海军

肖 劲 光

老战士面临新课题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的炮声刚刚停息，我在长沙突然接到军委的电报，说毛泽东主席召见我，有要事面商。我只带一名秘书，急忙赶到北京，去中南海晋见毛主席。

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便坦率地说：我是个“旱鸭子”，连坐船都晕得厉害，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毛主席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停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20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依靠苏联援助。你们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会俄语，也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你们来当司令还是合适的。他还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拉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没有海军不行。听了主席这番话，我没再说什么。毛主席嘱咐我，回长沙后，继续抓好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的事等

待中央的正式决定。

12月中旬，毛主席在赴苏联访问前夕，再次召见我。他说，这次出国访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会谈中，将会涉及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其中也包括海、空军的技术装备。他征求了我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并询问了我所知道的苏联的一些情况。当时，他强调指出，世界上愿意真诚援助我们的大国只有苏联。我们要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海军建设过程中，要很好地向苏联海军学习。

几天以后，林彪从广西前线返回武汉，在长沙逗留时告诉我，关于我调海军的事，中央曾打电报征求四野领导的意见。四野领导原打算让我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他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又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说：“为了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紧接着，军委又于1950年1月12日发布了我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

这是一道崭新的课题，而且是一道难题。当时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曾经扬言：“共产党要想建设海军，无异痴人说梦！”这当然是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狂妄之词。但是，当时遇到的困难，的确是大极了。

困难首先来自缺乏知识。几十年中，我都是在陆军部队工作，虽曾两次赴苏联学习军事，但学的都是陆上部队科目，除了到波

罗的海苏联的一艘巡洋舰上参观过一次训练外，从未接触过海军。对于海军的人员组成，武器装备，各国海军的情况以及海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都不清楚，甚至连起码的海军知识都没有。所有来自陆军的同志，也都不懂海军，一时不知怎样开展工作。

其次，我国海军基础薄弱，也是一大困难。我国拥有长达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辽阔海域，但长期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清朝末年曾建立过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海军，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指挥上的无能，在海战中损失殆尽。国民党组建的海军，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也几乎全军覆没。抗战胜利后，美英援助重建海军，但也可怜得很，武器装备大都破烂不堪。至于人民海军，在我受命组建的时候，华东军区海军刚组建半年多，装备只有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一些舰艇，不但质量差，数量也不多。华南和青岛地区的海军，架子都还没有完全搭起来。军舰、飞机、海岸炮，以及油水补给船，当时都没有。缺少象样的码头、机场，也缺少油料和各种物资。国家底子薄，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搞海军建设。我到威海，要到刘公岛去察看，但是没有船，只好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渔民说：“你是个海军司令员，还要租我们的渔船？”这话对我刺激很大。

困难还来自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斗争形势。1950年初，解放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东南沿海的岛屿尚未解放。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他们暂时拥有的海、空优势，对大陆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并天天派飞机来狂轰滥炸。刚组建的人民海军，不但要同敌人频繁的骚扰破坏进行斗争，而且担负着解放沿海岛屿，准备解放台湾的繁重任务。及至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并命令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我国沿海斗争的形势更趋紧张。我们不但要随时准备粉碎来自东南沿海的美蒋反动派的

侵略和袭扰，还要严密监视朝鲜战争的发展局势，警惕来自北部海域的侵略，保卫祖国首都的安全。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哪项任务紧急就先抓哪一项，许多事情办起来，就显得特别棘手。

当然，有利条件也是有的。主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坚决支持，还有各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苏联也给予了热情帮助。从陆军调来的大批干部，虽然不懂技术，但是政治素质好，觉悟高，只要把他们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当时既感到任务艰巨，又满怀信心，要说是有点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也是可以的。1950年1月下旬，我正式移交了第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离开长沙，于2月中旬抵达北京，开始了我在海军30年的工作历程。

途经武汉时，我到华东军区海军的海防第一、第二舰队（相当于后来的支队）和江防舰队，看望指战员，并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停泊在长江水面的这几十艘舰艇，是从长江下游疏散到这里来防空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自己的舰艇，心情十分兴奋。当时第一、第二舰队各有护航舰、炮舰和登陆舰10来艘，江防舰队有小艇三四十艘。舰队负责人肖平、陈绍海等向我汇报了这些舰艇的性能以及武器装备、人员编制等情况。我在舰队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这是我第一次检查海军部队的工作，也是我学习海军知识的第一堂课。既熟悉了部队情况，又耳闻目睹了过去不知道的许多新知识，新事物。

到北京以后，我在繁忙的筹建工作中，仍抽出时间继续学习有关海军方面的知识。主要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向苏联专家请教，使我在有关武器装备和码头、基地建设等方面逐渐增长了知识。另一个是找部队的负责人来汇报工作。记得最早来交谈的是华

东海军的作战处长赵汇川，他向我谈了华东海军组建以来的详细情况，使我初步了解了部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摸到了海军建设的“家底”，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正准备解放台湾，渡海作战，海军将担负重要的使命。我通过阅读敌情资料，找国民党原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交谈等方法，对台湾海军的实力和作战特点，有了概括的了解。然后组织人员对我军登陆作战所需要的舰船数量和物资储备等进行摸底。在这方面，华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粟裕给了我很大帮助。解放台湾是华东军区面临的首要任务，华东军区海军的组建又一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所以那时他比我更了解华东海军的情况。1950年3月11日，我们一起商谈了攻台的准备工作。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船有多少，能参加渡海作战的有多少，打算出动多少舰艇担任战斗和护航任务，多少舰船担任运输任务；如何搞好战前训练，准备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他都讲得很清楚。随后，我又抓紧时间，突击学习了指挥登陆作战的有关知识。这样，忙了几个月，直到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延期解放台湾的决定后，这方面的紧张工作才逐渐缓和下来。

这年冬天，当一些最紧迫的工作大体就绪以后，为了探索海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于11月中旬起程去苏联进行了一次考察。由苏联派来我海军任首席顾问的库兹敏陪同前往（他在途中得了阑尾炎，被留在当地动手术）。我们抵达莫斯科后，苏联海军派一位副司令员陪同我们到列宁格勒，参观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看了在十月革命中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并参观了列宁格勒海军学校。那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四五年，苏联海军也还很困难，武器装备比较落后，最大的军舰仍是几条老巡洋舰。造船厂也很简陋，坐落在一片废墟上，到处堆积着瓦砾和废钢铁。尽管如此，当时苏联领导

人和广大群众，对我们是很热情的。我很理解他们的难处，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过高要求。

除了参观，我还走访了10多位苏联海军高级将领和部队负责人，请他们介绍苏联海军建设情况，分析世界海军的发展形势，以及对海战中一些重要战术原则的意见。使我比较系统、全面地学到了一些海军科学知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我国海军建设同世界上那些大国海军建设的巨大差距。从而增强了加紧建设人民海军的责任感。

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在组建海军领导机关时，碰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海军领导机关是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还是一个兵种。其次，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个城市。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两个问题不明确，不仅许多筹建工作难以进行，而且关系到海军的长远建设。

我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参考了苏联和美国海军的情况。它们的海军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和领导机构。我国也是个大国，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坚持海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得到指示。同时，海军与政务院许多部门，如外交、交通、水产、科委以及各工业部门，都有密切关联。设在北京，才便于及时洽商和解决问题。

这时，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我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聂总往莫斯科给毛主席挂了长途电话。事后，他告诉我，毛主席回话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两个问题一经明确，

筹建海军领导机关的工作便逐步展开。

但是，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宣布成立后，我又当面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问：“你们机关搞了多少人？”我回答说：“大约900人。”毛主席听了，说：“人不多嘛。海军是个决策单位，应该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

没有房子，在当时的确是个难题。北京原有的公房，几乎全部让先进城的部队、机关住满了。在还没有定下海直机关设在哪里之前，我就派当时十二兵团供管处长景宜亭带着二三十人，编成3个小组，分别到天津、青岛和北京，为成立海军领导机关找房子。在天津、青岛都很快找到了一些房子，唯有北京难找。直到1950年2月中旬，我从长沙来到北京，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后来通过政务院有关部门调拨给几处房屋，我们又花钱买了一些私房，并租了几家旅馆，这才让先后到来的一些干部、战士住了下来。我开始住在东城的麻线胡同，不久搬到北新桥的大头条，在一个小院里，一直住了近30年。司、政、后等机关和一些部队，分散居住，几乎遍及半个北京城。后来写报告，由周总理批款，在建国门内一个叫贡院的地方盖了几座楼，司、政机关才相对集中在一处办公。

根据军委的决定，组建海军直属机构，主要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直属队抽调部分机构和干部。总的原则是，既要考虑海军建设的需要，又要保证第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领导工作不受太大影响。我和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黄克诚等同志商量，按军委指示，我调离湖南以后，军区司令员也由他兼任。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认为，组建海军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需要抽调多少就抽多少，需要调谁去就调谁去。随后，我又同干部、军务部门商量，决定抽调1/3至2/3的人员来海军。科以上干部的名单，是由

我逐个审定的。各科的干部则由科长们商定。随后将名单上报第四野战军领导审批，才最后确定下来。

当时从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调来海军的有司令部(含通信队)300余人，政治部(含宣传队)200余人，兵团卫生科及供管处全部300余人，军政干校约700人，还有警卫团两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总共2000余人。其中一部分来北京组建海军直属队，其余到青岛筹建后来的青岛基地。当时的海军后勤部，主要是以四野后勤二分部的人员为基础组建起来的。1952年，第二野战军第十军军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又调来充实了海直机关。

最初海军领导机关沿用陆军的编制，设立司、政、后、卫四大部。司令部由罗舜初任参谋长，下设作战、情报、机要、军训、军务、炮兵、通信联络、组织动员、管理处等；刘道生兼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化、青年等二级部；张汉丞任后勤部长，丁世芳为卫生部长。当时机构比较精干，办事效率也比较高。常常采用集体办公的方式，几个领导凑在一起一商量，定下来就分头去执行。

1950年4月初，各路人马大体到齐。经报告军委同意，于4月14日，在当时协和医院礼堂，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主要讲为什么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分析了建设这支海军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对于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我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想法。只讲了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支防御的、自己的海军，要建立一支轻型的舰队。我们的优越条件是靠近海岸，有众多的岛屿，等等。这些想法，是后来制定海军建设方针的基础。

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军种，管理和指挥全国各地的海军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在海军领导机关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司令员，刘道生任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4月下旬，军委任命王宏坤为海军副司令员。6月，又任命罗舜初为海军参谋长。1952年3月，罗舜初升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由周希汉接任海军参谋长。1953年2月，原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强，调海军任第三副司令员。这年11月下旬，苏振华调来海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2月升任海军政治委员）。以上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7位主要领导干部。大家怀着建设强大海军的共同目标，来到了海军，同广大指战员一道，为海军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今天，有的已经辞别了人世，长眠于地下，健在的也都已离开海军领导岗位。这些同志，尽管各自都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以至错误，也不管彼此之间有过什么争论和分歧，但他们为创建人民海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想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创办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

还在我刚刚受命组建海军的时候，即1949年10月间，我在北京遇见了后来任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思。学思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同父异母兄弟。在时代洪流的冲击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他在青年时代就成了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到了延安，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道路。学思告诉我，从这年夏天开始，他就奉军委之命，在原安东海校的基础上，负责筹办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军委派他赴苏联进行了一次考察，参观了几所苏联海军学校，还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办校。9月下旬，他刚从莫斯科回国。军委原打算让他担任大连海校的校长。他认为建军和建校历来都是一致的，最好由司令员兼任学校领导，他准备报请军委任命我兼任校长。

大约1个月以后，军委作出决定，任命我兼任大连海校校长和政治委员，张学思为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当时由于海军领导机关尚未成立，我也没有到职，许多工作都是

由军委总部直接部署，东北军区具体领导，张学思负责筹办的。经过学思四处奔波，又与苏联顾问多次商议，并报经军委审批，学校的校址、学制、教员配备、招生人数等问题，都先后得到了解决。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

3月中旬，我第一次听取了海校情况的汇报。当时学校的负责人，除我和学思以外，还有政治部主任李东野。全校有苏联顾问80多人。教员除由“重庆”舰起义军官16人担任以外，还从大连大学聘请了10几位教授兼任。开始，学员只有200余人，分为速成班和普通班。速成班的学员是从地方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选拔的，普通班的学员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不久，改按专业分为航海指挥和机械工程两个系，每系按文化程度分为两年和3年学制，并按具体专业分为若干班次，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机电等水面舰艇的干部。

4月中旬，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刚开过，我就从北京赶到大连海校。学校的校址坐落在大连老虎滩风景区一侧，我到达时，校舍已经初步维修，面貌焕然一新。学校刚办起来，困难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干部，其中主要是缺教员，特别是缺有海军科学知识的教员和一定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此外，由于苏联顾问多，翻译也显得严重不足。二是缺经费和教学器材。例如，当时需要实验室30余个，已建成的只有12个，实习用的军舰、枪炮、无线电器材等等，都很缺乏，有的根本没有。面对这些困难，我一方面勉励全校师生员工，自力更生，艰苦办校；另一方面，也及时向军委、总部反映，并通过中央和政务院有关部门，向地方院校要求支援。仅1950年底，便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院校，招聘了30多名高年级学生和计算机专家慈云桂等来校任教。我还通过湖南军区，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懋修、数学教授